政治认同的现代提升 ——基于民族国家建构的向度

曾楠

(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广州, 510515;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摘要: 与近、现代化发展相伴生的是民族国家的诞生, 民族国家仍旧是现今世界所区分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单元。在一定程度上说, 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即是民族国家的认知、建构与变迁的历程。民族身份谋定、族属认知皈依、公共权力自觉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预设与事实证明。从国家建构向度审视政治认同的现代提升, 可得出国家建构的身份谋定、族属认知、权力自觉预设与政治认同的三维界面, 即个体特性自我确证、他者世界承认归属、权力权威遵从信任呈现直接呼应与正向推动。

关键词: 国家建构; 政治认同; 民族身份; 族属认知; 公共权力; 个体特性; 他者世界; 权力权威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7)02-0127-07

“政治认同, 是指一个人感觉自我属于政治单位的某个成员, 并强烈地依附与效忠该单位或团体。”^[1]从“自我认同—集体认同—政权认同”的纵向审视, 政治认同呈现个体特性自我确证、他者世界承认归属、权力权威遵从信任三维界面。近代以来, 与现代化进程相伴之的是民族国家的诞生。汤姆森曾指出: “民族国家是(现今)世界所区分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单元, 这个事实意味着在民族身份的构建中常常包括大量的、有意识的‘文化构建’。”^[2]由此观之, 在一定程度上说, 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即是民族国家的认知、建构与变迁的历程。民族身份谋定、族属认知皈依、公共权力自觉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预设与事实证明, 其正与政治认同的三维界面相呼应。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是在民族成员共同生活的底版上紧密地相互渗透与影响, 政治认同也往往在民族成员对民族、国家的理性与情感的认同交织中如期而至。由此, 从国家建构向度澄明政治认同的现代提升是当前政治认同形塑的理论通途与价值所指。

一、民族身份谋定: 个体特性自我确证

民族身份是寻求“我是谁”的旅程中最深层的铭

记, 它以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和体制所预设的不可退出与不可逆转的族际烙印回答着“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民族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 它被建立在一系列有关历史、公民权和‘民族’附属物的包容性与排他性之上。”^[3]在当今多维、多元、多重、多变的时空场景中, 民族身份的建构不再是附魅型的神秘预设, 而在超民族国家与次民族国家的挑战与张力中呈现异质趋同与排他斥异的现代紧张。“‘民族身份’是一个‘形成’的问题, 也是一个‘存在’的问题……它决不会完成, 始终都处于过程之中。”^[4]民族身份亦未停留在某个过去, 而是在推进社会发展的各力量中不断地运动与“形成”。

当前民族身份建构在历史、文化、权力的撕扯与运动中, 呈现全球化时空下的民族意识消解、市场化裹挟下的身份认同式微、多元化裹挟下的归属多重困惑等认同危机。“全球化代表了这样一种趋势, 一种将世界各地的人群组合成一个整体的全球社会的趋势。”^[5]全球化在以世界公民、普世文化、全球市场等物质、精神、身份各界面的整合趋势中, 消解着传统民族国家的意义注解, 弱化着传统国际法则对民族认知的时代注解, 挑战着民族存续“意向性关联”中的生成特质与个体特性。全球化进程中, 一切以全球化的态势对民族国家的消解强化着民族身份意识的游离

收稿日期: 2016-05-21; 修回日期: 2016-10-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生视域中的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研究”(14CKS011);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九批特别资助“国家建构视域中的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研究”(2016T90185);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资助项目“文化正义视域中的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研究”(2015M571224);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马克思主义专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研究”(MYZY201608)

作者简介: 曾楠(1986-), 女, 江西吉安人, 法学博士, 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站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 政治哲学

与文化离散,使民族国家存在向度的公民权实质性萎缩,在世界公民身份、地区公民身份、联邦单位公民身份、城市公民身份等多元注解中消解民族意识。“‘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市场化进程中伴随着利益的凸显与传统“机械团结”的坍塌,在“物权”的价值承认中,“不但不把社会各种不同的部分联系起来,反而把它们隔离开来,并为它们划定明确的界限”^[7]。一切以等级化、序列式、层级型表征的阶层界限均不断弱化着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这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是一个除魅的时代,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是一个工具理性主导的时代。价值世界的多元分殊与工具性价值的事实性统摄使个体民族身份在各种似是而非、去中心化的解构面孔中模糊;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压缩重叠中模糊;在世界的与地方的强调中动摇;在麻痹与调侃的挤压中摇摆。换言之,多元化裹挟下的身份感的无力与归属感的多重从未像现时代如此“挣扎”。

正如吉登斯所言:“危机的情境有时会威胁到自我认同的核心本身。”^[8]自13世纪至16世纪共同体秩序与独立的法律与宪政观念紧密相依的社会转型以来,“国家而非统治者个人就被看成是其领土范围内的法律及合法性武力的唯一来源的可能”^[9]。“现代性的一些重大特征,如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理性、国家构建”^[10]等,对于人们身份的形成、利益的呈现与交互的存在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民族身份是民族成员被纳入民族国家时的文化定位与政治归属。传统民族身份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征程中表现出传统的单一内部民族认同的贫乏与脆弱,而政治共同体权力、义务边界规约下的“社会地位”获得成为现代民族身份谋定的可能出路。“在显然是模棱两可的(民族)一词的背后,却有一个目标是大家共同追求的,且该目标清晰、坚定,深深地根植于政治的领域中。”^[11]弗雷泽以“参与平等”身份为核心的承认政治正义论认为,国家建构是在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正当、“宪法”规制下“参与平等”的现实正当、“共同体想像”下的价值正当等历史与现实、事实与价值的辩证张力中谋定现代民族身份的。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三千多年前即已有“中国”之称号,自此虽朝代更迭、历经分分合合,但由多民族融筑的“中华民族”并未出现过任何的断痕,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语)。近、现代以来,历经西方帝国的坚船利炮的残暴侵略,现代中国仍在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逻辑蹈演中不断寻求民族的崛起与自主。由此,基于多元一体格局的现代

国家建构为民族身份谋定提供了历史正当。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民族的平等、团结,反对大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域下推进普遍正义与“参与平等”。由此,基于“宪法”规制下“参与平等”为民族身份谋定提供了现实正当。正如安德森所述“印刷术培育了民族主义”,中华民族在脱域化情境中以共同的“文化消费”凝结的“共同体想像”,使民族成员的利益、权力、共通融进大众的记忆中,集结“想像的我们”与“我们的想像”。由此,国家建构进程中“共同体的想像”为民族身份谋定提供了价值正当。

认同“是行动者自身的意义来源,也是自身通过个体(Individuation)过程建构起来的”^[12]。个体特性自我确证是自我认同的意义指向与价值来源,亦是政治认同的自主主体面相。现时代在第三次个体化浪潮进程中,个体特性面临碎片化、虚无化、工具化等风险。“个体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历史进程,它越来越多地质疑并趋向于打破人们传统的生活节奏——社会学家所称之为的标准传记。……坦率地说,标准生活史让位于自我创造生活史。”^[13]在“流动的现时代”“瞬息即为变化”的时代场景中,个体承载的历史记忆被利益多元、身份多重的现实漩涡所“肢解”,余留的即是在碎片化的零星记忆中努力拼凑的“现实的我”。在现时代的身份谋定中,民族身份作为一种历史、体制、文明所预制的社会建构,其有利于拾起碎片的个体记忆,回应着碎片化中个体的特质分解与身份崩塌。“当人真实地置身于一个风险无处不在的社会时,他可能就会对他人保持高度警惕,甚或奉行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的法条,或将自己包裹,陷入强烈的‘个人的无意义感’。”^[14]在吉登斯所述的风险无所不及的“风险社会”中,个体在挣脱神意的启示、宗族的联结、传统的束缚后陷入深深的虚无与空洞,在冲破“上帝死了”“人死了”的呐喊后“什么都死了”的慨叹既是对价值秩序的挣脱,也是价值次序序列陷入彻底虚无的征兆。民族身份作为在“想像的共同体”的身份建制,其在“风险社会”侵袭下的身份谋定放缓着虚无的吞噬,在民族政治身份、民族文化身份、民族社会身份的多维建制中寻求个体彻底虚无后真实的“在”,即海德格尔所言的“此在”,回应着虚无化中个体的存在茫然与身份消解。现时代的个体“既在挣脱传统中独立,又在传统的倒塌中孤立,在独立与孤立的张力陷入‘与自我及他人疏离’”^[15]。工具性的成长偏轨、工具性的视域考量、工具性的利益追逐,现时代获得“自由”的个体陷入由“人是目的”转变为“人是手段”的工具化境地,转为马尔库塞所言的

“单向度的人”，陷入鲍曼所言的“被围困的社会”。民族身份是在“构成性的善”的意义共同体下的身份识别，它在“重拾意义”“追求美德”的意义诠释中挣脱工具“殖民”的个体，回应着工具化中个体的利益裹挟与意义消泯。简言之，民族身份谋定回应着个体特性的碎片化、虚无化、工具化风险，在民族想像的身份识别中回答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二、族属认知皈依：他者世界承认归属

作为一种判定过程，族属认知是寻求“我们是谁”、“我们和谁是一伙的”的历程中最深刻的凝聚，它以经验的共通、想像的共在、象征的共存所预设的先天族属判定回答着“我们”与“他们”的区别，进而将“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此探讨的族属认知是就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域下的族际归属而言的。史密斯曾指出，族属认知“并非外在的发明或无意的浮想，而是借由历史共在的积淀与象征性文化活动而凝聚产生”^[16]的。近、现代中华民族的族属认知在西方意向性关联的“他者”建构中，在西方文化的不断规训中，甚或在部分国人的有意“合谋”中呈现出传统失语与记忆重构的现代紧张。

“没有共同体的自由意味着疯狂，没有自由的共同体意味着奴役。”^[17]当前族属认知皈依在远古记忆情感与“高度压缩”的时空的交错缠绕中，呈现他者语境中书写异化、压缩时空中价值序列紊乱、社会分化中秩序失范等认同危机。周宁教授指出：“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18]该幻象以西方为主体，而将他者为幻象的客体，在以自我主导的模式下想像他者与书写他者，其实质是在自我的文化建构中、“他者”的意向描绘中寻求西方的自我定位与自我意识。近一百年来，西方在框定“他者”以寻求“我们”的建构中，将中华民族的形象从进步演变为停滞，从自由演变为专制，从闪烁演变为落后。在历经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现时代，“红祸论”“黄祸论”“威胁论”等论调又甚嚣尘上。在“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建构中，中华民族成员的族属认知在他者语境的书写异化下可能呈现认知偏失与认知“矮化”，进而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代同堂”的压缩时空中，前现代阿卡迪亚式田园牧歌的怀念、现代迪尔凯姆式的创造性狂热、后现代德里达式的碎片解构将依附型个体

抛向了齐泽克所称的“实在界”的荒漠，差异与同一、断裂与弥合、趋同与斥异挑战着传统的单一价值序列，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在传统与现代、主流与非主流、大众与精英的碰撞中陷入紊乱。在“差异”与“共识”的互动逻辑中，中华民族成员的族属认知可能在压缩时空价值序列紊乱下呈现认知失调与认知模糊，进而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现时代“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与变动”^[19]使社会从均质化走向了异质化，共同体社会走向个体化社会，利益的多元、身份的多重使社会走向阶层的“分化”与“分流”。从“普遍受益”转向“受益分流”的社会分化期，社会秩序陷入一定程度失范与偏轨。正如亨廷顿所言：“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流动机会的缺乏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低下导致了社会颓丧和政治动乱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20]在“一体”与“分化”的博弈动态中，中华民族成员的族属认知在社会分化的秩序失范下可能呈现认知焦虑与认知茫然，进而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

英国学者鲍伯·杰索普曾指出：“民族国家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像、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21]在超民族国家、次民族国家的撕扯张力中，国家建构仍然是族属认知皈依的重要力量与意义来源。正如史华兹所述：“民族的产生是在国家的创造中呈现的，而非相反的过程。”^[22]在消解、模糊、不确定日益盛行的现时代，国家建构下的财富、权力、价值观的共享有利于形成“我们”感的族属认知皈依。共享是从“我”走向“我们”的文化心理机制，是将“我们”带入同一叙事体系的现实动力机制，国家建构下分配正义的回答、权力公正的回应、价值共识的凝聚直接紧合“我们”感的事实认知与价值判断。在“私”的放逐的历史进程中，在“到处寻求市场”的利益冲动中，在“他人即是地狱”的丛林法则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财富分化使传统共同体走向瓦解，而国家建构下分配正义的回答有效地从“私”的放逐转向“私”的正当，从“到处寻求市场”的利益冲动转向“到时寻求市场”的财富共在，从“他人即是地狱”的丛林法则转向“我们是一伙的”共生共存，在分配正义的回答中形塑利益的共同体，进而促进族属认知“我们”感的事实共在。人在本质上是“政治动物”，政治的核心即权力。在权力天然僭越的征程中，权力判定法则渗透于公共权力领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传统时期，特权阶层垄断权力使传统共同体走向离散，而国家建构下权利公正的回应使权力的天然僭越在有限的“城池”中行使，公共权力领域、公共领域及私人领域有限分离，权力判定法则仅限于公共

权力领域,个体间在权力的公正与制度的正义中获得相互的承认与接纳,正如霍耐特所言:“相互承认创造了这一理想共同体,同时也就形成了‘民族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也出现了民族风俗的‘生动实在性’。”^[23]可以说,国家建构在权力公正的回应中形塑制度的共同体,进而促进族属认知“我们”感的心理归位。“民族的认同和共同体是由‘此处的感觉’和‘主格我们的感觉’构成的”^[24],价值共识的凝聚则是“主格我们的感觉”的灵感与象征。在“祛魅”分化的事实性统摄与“诸神争吵”的现时代感知下瓦解着传统共同体,而在国家建构下价值共识的凝聚则使得“祛魅”分化不再是哗然式的游离,而是象征共鸣与理念共通的福音,“诸神争吵”不再是献祭般的表演,而是规范共蓄与理念合音的前奏。由此,国家建构下价值共识的凝聚形塑着文化的共同体,进而促进族属认知“我们”感的价值澄明。

从元哲学解读,“他者”是黑格尔、萨特笔下本体论意义上主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维度,是共同体内部认同形成与发展的近乎决定性的力量。“他者”的框定是走向“我们”的通途,并在时间的推移与无意识中将“他者”与“我们”赋予天然给定的神秘。“人类天生追求的不只是物质,还有承认。”^[25]寻求他者世界的承认与“我们感”的归属是集体认同的意义来源,亦是政治认同的复合主体面相。约瑟夫·奈曾指出:“传播的瞬时性,使跨国认同、国家认同和次国家认同的潜在的紧张关系转化为突然的冲突。”^[26]在颇具张力的跨国认同、国家认同和次国家认同的错综交织中,他者世界承认归属面临意向性曲解、流变性漂浮、假想性疏离等风险。在近一百年的中西方碰撞中,西方在寻求自我认同的隐喻中以东方的中国为观照,在知识与想像、真实与虚假、焦虑与期望糅合的意向性关联中有意否定或贬低之,意向性曲解在部分中国本土部分分子的“鼓噪”下消解着他者世界的承认归属。族属认知是在真实的历史、体制、情境预设下的时空场域中生成的民族成员的民族情感与民族意志,族属认知皈依有利于在“自我”与“他者”的交锋中冲破“他者”的意向性曲解,在族属认知的判定中形塑真实形象,进而获得他者世界承认与“我们”感的共在。瞬息、即时、流变是现代性最生动的符号,然而流变的现代性中时时倒转的时空、时时变换的身份、时时更替的立场使自我与他者的界域陷于模糊甚或暧昧,他者世界的承认归属亦陷于模糊与迷茫,进而弱化着他者世界的承认归属。族属认知以不可退与不可逆转的先天族属判定确证着自我与他者,清晰地界定着自

我与他者的界线与视域,明确昭示着“我们”的真实与存在,进而推进他者世界承认与“我们”感的共在。近现代在西方强势渗透下,以“普世价值”为旗号的任意灌输与“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为标语的夸张性言说假想性地疏离着他者世界对自我的承认与评判。族属认知在民族独特性与民族自主性的言说中回击“普世价值”的曲解论调,回应“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的妄想说辞,在族属自觉认知的定位中汲取他者世界承认与“我们”感的共在。简言之,族属认知皈依回应着意向性曲解、流变性漂浮、假想性疏离等风险,在族属认知的时空凝聚中回答着“我们是谁”、“我们和谁是一伙的”。

三、公共权力自觉:权力权威 遵从信任

“何谓公共权力?一般来说,公共权力被认为是社会公共领域中由公众所赋予和认同,并能够给公众带来保护和幸福的集体性权力。”^[27]公共权力无论是“神旨”、“民意型”或“神喻型”赋予,或霍布斯“充满战争型”、洛克田园诗般的自然状态上的“契约型”赋予,均隐喻公共权力的获得需要正当性与合法性论证。公共权力源于指向“公共善”的交往实践、保障“私权利”的权利让渡、“共同体”的共通合作,无论是“能力说”“影响力说”“关系说”或“综合说”^①,公共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来源均指向“公共性”。在全球化、市场化、多元化的时空场景中,公权力冲破传统的神赋旨意说,在公权力与私权力、公权力与公权利、公权利与私权利等互动张力中呈现公共权力扩张僭越与理性正当的现代紧张。

孟德斯鸠曾深刻地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28]。当前公共权力在流动的、瞬时的、审美的现代性境遇中,呈现权力的利益偏轨、权力的边界模糊、权力的幻化放大等病态表征。“政治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公共目标而是为了攫取个人利益”^[29],在市场化的狂飙突进与“经济人”的冲动预设下,以公益为运行旨归的公共权力行使向私益越界扩张,在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的螺旋双桨驱使下呈现权力的利益偏轨:公共权力行使于农业资本、商业资本、生产资本、金融资本等资本形态中,僭越于市场经济规划之上;公共权力的“公共善”指向偏轨为某些个体或利益集团的资本收益与身份利益。

权力是在公权力与公权力之间、法律与公权力之间、社会权利与公权力之间所形成的制约序列下呈现

的。在权力与权利的正和博弈中，公民资格、政治权利、政治参与这一系列公民权利的彰显为权力的行使划定了边界。然而，抽象且形而上的边界判定在公民权利意识阙如、权力制衡力量松散、权力法律判定式微的境遇下往往走向权力吞噬权利或权力践踏权利的不当风险，公权力与私权力、公权力与公权利、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呈现模糊化与朦胧化倾向。“那东西如此神秘，可见又不可见，在场又不在场，无所不至又无孔不入，这东西就叫做权力。”^[30]公共权力在可见与不可见、在场与不在场的神秘领地中，极易以维护与促进公共利益为幌子导致权力的幻化放大，在所谓的“人民”的外衣或“服务”的说辞下幻化放大，各时空场域无所不至又无孔不入。简言之，权力的利益偏轨、权力的边界模糊、权力的幻化放大挑战着权力权威的遵从信任，弱化着公共权力走向理性与自觉。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31]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论述隐喻了国家与公共权力的内在关联。在“集体意识衰落”“道德的真空”“理性毁灭”“共同体失语”的“祛魅”现时代，现代国家建构从公共领域形塑、集体意识升华、共同体重构等维度可以防范公共权力的偏轨与异化，进而推进公共权力的现代自觉。公共领域是国家与社会的中间领域，是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中间“桥梁”，“它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的公众形成了，这种公共性使得公众能够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32]。现代国家建构在对权力与权利的合理张力互动中，有利于回应公共权力领域吞噬私人领域或私人领域消泯公共权力领域的风险，在形塑现代公共领域的进程中还原权力的“公共性”，在公共理性、公共舆论、公共参与等“公共性”赋值中推进公共权力的现代自觉。集体意识的衰落会使社会的凝聚力分散、道德失真且凝聚成一股力的精神引领式微。集体意识衰落是一幅在解构、去中心化、闲散化“幽灵”的游荡中不可逃离的现代景观，与集体意识衰落相伴之的是权力的公共性式微与权力的自觉性弱化。国家建构则试图在民族身份谋定与族属认知皈依的现代谋划中重拾有意识的与无意识的集体意识，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在有意识与无意识的集体想像中走向“公共性”的复归，进而推进公共权力的现代自觉。

在近、现代西方“普世论”的强力渗透与非主流“虚无论”的有意谋合下，“共同体失语”亦成为当前

意识形态领域的景观之一，与“共同体失语”紧随而至的则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苍白与权力权威的偏轨。因此，对现时中国而言，作为“发展的中国”“文明的中国”“和谐的中国”的多维现代国家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接续与再造应是“发展的中国”“文明的中国”“和谐的中国”建构的内在隐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接续与再造能有力地回应“意识形态终结论”或“历史终结论”等意识形态淡化或意识形态泛化的偏差言判，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接续与再造中重塑民族的“想像共同体”，在“想像的共同体”凝聚下还原权力的“公共性”，进而推进公共权力现代自觉。

政治认同是自我价值确证与他者世界承认的互动过程，是合法性呈现与权力权威遵从信任的双向过程。权力权威遵从信任是权威认同的意义来源与价值特质，亦是政治认同的应然客体面相。在现代性浪潮中所历经的市场化、多元化、个体化、信息化洪流中，权力权威遵从信任面临冷漠化、私密化、形式化等风险。在历经“政治狂热症”“政治肥大症”的彻底反思后，在利益维度伸张下的民族成员纷纷投进市场的怀抱，公民不再是独立的政治个体，而是在消费文化包围中的闲散的消费者，他们在进行偏好选择时不再以价值秩序为导引，而是以既定的物质需求菜单为浏览图。在物质需要菜单浏览图的世界中，“政治市场”这一怪异的“商品”，则可能会被“消费者”直接屏蔽。在市场洪流中纷纷得了“政治冷漠症”，这种冷漠往往以与政治体系的疏离或对政治无动于衷为表现形态，对权力权威的遵从信任亦以冷漠以回应。公共权力自觉是还原权力公共性的自我觉醒，是对权力正当边界与权力合理判定的理性自知，它有利于在权力与权利的张力中冲破权力吞噬权利的传统性误区，在权力的公共性指向下真实地走向“公共善”，进而使公民对权力权威的冷漠走向遵从信任。波兹曼曾言这个时代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在一切均可娱乐调侃的现时代，权力权威的遵从信任被异化为私密性的调侃表达，从“我参与故我在”转化为“我娱乐故我在”，“我行动故我在”转化为“我调侃故我在”，私密性的调侃狂欢使公民对政治纷纷得了“政治唯私症”，这种私密性则往往以政治事件的麻痹或政治话语的调侃为表现形态，对权力权威的遵从信任亦呈现私密化的样态。公共权力自觉是对权力的来源、合法性、正当性的理性自觉，它有利于在权力与权利的正和博弈中冲破权利消泯权力的可能性风险，在权力的公共性指向下走向权力的应然，进而使公民对权力权威的私密性走向遵从信任。“媒体信息和符号制造术四处播散……面对信息的无休无止的狂轰滥炸，……大众已经感到不堪

其扰并充满了厌恶之情。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而沉默的大多数。”^[33]在庞杂的信息与纷杂的生存样态下,公民对权力权威呈现“形式的默许”与“实质的冷漠”生态,在沉默的大多数面具下实质是对权力权威遵从信任的形式化。公共权力自觉则在权力公共性的实质性赋予下走近沉默的大多数,在权力的转化序列中使个体的权利获得肯认,进而推进公民对权力权威的形式化走向遵从信任。简言之,公共权力自觉回应着权力权威遵从信任的冷漠化、私密化、形式化等风险,在公共权力的自觉形态中回答着“何谓政治”以及“我们属于哪个政治共同体”。

四、结语

总之,与近、现代化发展相伴生的是民族国家的诞生,民族国家仍旧是现今世界所区分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单元。民族身份谋定、族属认知皈依、公共权力自觉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预设与事实澄明。民族身份是民族成员被纳入民族国家时的文化定位与政治归属,它作为一种历史、体制、文明所预制的社会建构,有利于抵御第三次个体化浪潮进程中,个体特性面临碎片化、虚无化、工具化等风险,进而推进个体特性的自我确证。族属认知是借由历史共在的积淀与象征性文化活动而凝聚产生的“我们”感,它作为以经验的共通、想像的共在、象征的共存所预设的天然判定,有利于降低跨国认同、国家认同、次国家认同错综交织中,他者世界面临的意向性曲解、流变性漂浮、假想性疏离等风险,进而促进他者世界的承认归属。公共权力是由公众所赋予和认同,并能给公众带来保护和幸福的集体性权力,它作为政治共同体维系的有力支撑,有利于应对市场化、多元化、个体化、信息化洪流中,权力权威面临的冷漠化、私密化、形式化等风险,进而推进权力权威的遵从信任。由此可见,个体特性自我确证、他者世界承认归属、权力权威遵从信任的政治认同的三维界面与民族国家建构的身份谋定、族属认知、权力自觉与政治认同的三维界面呈现出直接呼应与正向推动。

注释:

① “能力说”主要指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界定权力时提出的“一个人或一些人在社会行为中,甚至不顾参与该行为的其他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影响力说”主要指拉斯韦尔和卡普兰等提出的“权力是施加影响的过程,即借助由于不

遵守所想要的政策,予以(实际或威胁予以)严厉剥削,从而影响他人政策的过程”。“关系说”主要指霍布斯指出的“权力应定义为一种因果关系,一种主动出击的行为者与被动的承受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综合说”主要指《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提到的“权力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影响力等”。

参考文献:

- [1] 沃特·罗森堡姆. 政治文化[M]. 陈鸿瑜译. 台北: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84: 6.
- [2] John Tomlinson. Cultural imperialism[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69.
- [3] 亨利·A·吉鲁. 民族身份与多元文化论的政治[J]. 阎嘉译. 江西社会科学, 2008(3): 247-253.
- [4] 石海军. 从民族主义到后殖民主义[J]. 文艺研究, 2004(3): 44-50.
- [5] 李鑫炜. 体系、变革与全球化进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5.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103.
- [7] 埃米尔·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渠东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81.
- [8]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赵旭东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217.
- [9] 约翰·格莱德希尔. 权力及其伪装——关于政治的人类学视角[M]. 高丙中, 周大鸣, 赵旭东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26-27.
- [10] 马克·I·利希巴赫, 阿兰·S·朱克曼. 比较政治: 理性、文化和结构[M]. 储建国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2.
- [11] 马克斯·韦伯. 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M]. 李强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124-125.
- [12]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68.
- [13] Beck, Beck-Gernsheim.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M].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3: 88.
- [14] 姜奇平. 软实力的后现代意义: 认同的力量[J]. 信息空间, 2004(8): 44-51.
- [15] 埃里希·弗罗姆. 逃避自由[M]. 刘林梅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7: 22.
- [16] Ant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M].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20-21.
- [17] 齐格蒙·鲍曼. 生活在碎片之中[M]. 郁建兴等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2: 142.

- [18] 周宁. 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
-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75.
- [20] 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 刘为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42.
- [21] 鲍伯·杰索普. 重构国家、重新引导国家权力[J]. 何子英译. 求是学刊, 2007(4): 28-32.
- [22] 本杰明·史华兹.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M]. 程钢译. 苏州: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 25.
- [23] 韩震. 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 106-113.
- [24] 丹尼尔·德德尼. 土地上的认同: 民族主义的自然、地方和距离[C]//拉彼德·赫拉托克维尔编, 金烨译. 文化与认同: 国际关系回归理论.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81.
- [25] 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的起源: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 毛俊杰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398.
- [26] 约瑟夫·奈. 硬权力与软权力[M]. 门洪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86.
- [27] 刘圣中. 私人性与公共性——公共权力的两重属性及其归宿[J]. 浙江学刊, 2003(2): 70-74.
- [28] 查理·路易·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M]. 张雁深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151.
- [29] 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2.
- [30] 杜小真. 福柯集[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 204.
- [31] 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76-177.
- [32] 尤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C]//汪晖, 陈燕谷主编. 文化公共性. 上海: 三联书店, 1998: 125-126.
- [33] 道格拉斯·凯尔纳, 乔治·贝斯特. 后现代理论: 批判的质疑[M]. 张志斌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12.

Modern ascens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Based on the dimension of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ZENG Nan

(College of Marxism,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Nation-state, whose birth was accompani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is still the world's most distinguishably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uni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s a process of cognition, construction and vicissitude of nation-state. National identity seeking, family cognition conversion, public power consciousness constitute the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 and factual clarity of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nation-state. Viewing the modern ascens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we can such deduce three dimensional interfac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s identity seeking, family awareness, conscious power presupposition and political identity, which indicate respectively self-confirmation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recognition of attribution by the Other world, and power authority that evolves from trust to natural echoing and positive propelling.

Key words: national construction; politic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family cognition; public powe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the Other world; power authority

[编辑: 颜关明]